

古典文学新论编委会
湖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 编

主 编 张国光
副主编 曾宪祝 李延夫

古典文学新论

武汉出版社



《古典文学新论》编委会

主 编 张国光

副主编 曾宪祝 李延夫

编 委

马承五	王齐洲	王远彦	石 麟	邱汉松	俞大平
纪国盛	张国光	李延夫	李儒科	汪晚香	何新楚
杨建文	易锦海	单长江	周达斌	金家兴	孟进厚
胡绪伟	盛瑞裕	萧世杰	萧毓梓	翁柏年	曾大兴
曾宪祝	韩光泽	程伯安	魏平柱		

编辑部负责人

曾宪祝 萧毓梓 (武汉广播电视大学 邮编430033)

余大平 (湖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所

邮编430062)

编 辑 熊春风

湖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

顾问：李尔重 姚雪垠 胡国瑞 石声淮 朱祖延

会长：张国光

副会长：王启兴 黄海鹏

学术委员：

王启兴 吴志达（武汉大学）

黄清泉 温洪隆（华中师范大学）

张国光 李悔吾 王陆才（湖北大学）

吴文蜀（湖北省社科院文学所）

黄瑞云（湖北师院）

曾庆全（中南民族学院）

黄海鹏（黄冈师专）

葛楚英（孝感师专）

洪源（武汉出版社）

秘书长：翁柏年

副秘书长：余大平

卷 头 语

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古典文学作家犹如繁星丽天。他们经历过几十个世纪的辛勤耕耘，在这辽阔而富饶的中华大地上，撒播了无数的种子，使之发出璀璨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尽管随着时间之流的冲刷，使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或者被禁毁，或者因为无法刊印流传而致散失、湮灭，但是迄今得以存留下来的一部份古代散文、诗歌、词曲、小说、戏剧等等作品，仍然是汗牛充栋。它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巨大源泉，同时也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我们的民族应以有这样一批珍贵的遗产而感到骄傲，它也理所当然地为外国朋友所珍视。为我们所尊敬的大文豪歌德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就曾致力于中德文学的交流，并盛称：象为德国人所赞赏的《好逑传》，还不能说是中国最好的作品，“中国人有千万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他还称赞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切都比我们显得更明理、纯洁和道德”，而且“外界的自然和人物总是同时生活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遗产从来都是很重视的。马克思就盛称希腊的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一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4页）列宁也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的历史知识财富，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选集》第4卷38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强调：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这就说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使当代广大的读者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与鉴赏，培养高尚的情操，提高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觉悟，并且借鉴古典作品的艺术技巧，作为从事当代文学创作的手段，以此作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股动力，这是我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一项光荣的任务。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场浩劫，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从而使我国的学术研究逐步走向了繁荣的局面。随着各省市社会科学期刊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创办，使我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得以象雨后春笋般地面世。无论是全日制高等院校，还是成人高等院校的中文系科，也都把中国古典文学列为主课。这样除了一些科研院所的专职研究人员和业余爱好者得以全力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以外，高等院校的古典文学教师就“一身而二任”，他们既有讲授较为繁重的古典文学课程的任务，又有深入钻研古典文学教材，探讨中国文学史发展规律，以及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对古代作家及古代作品进行深入发掘，广泛开拓，借以提高教学质量，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的任务。

我们湖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就是要加强高等院校的古典文学教师之间以及他们和科研院所与其他单位的古

典文学专家之间的联系，把这两股研究力量“拧成一股绳”。我们期望发扬大家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多出成果，以利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双丰收。

我们开辟的这一园地之所以命名为“古典文学新论”，就是由于我们力图要防止一种盲目的崇拜古人，以至于食古不化的偏向。我们强调的是，古为今用，“不薄今人爱古人”。文学批评家、诗人陆机在《文赋》中所描写的“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己披，启夕秀于未振。”这也是我们认为应该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的辩证法观点。明人方孝孺有诗说：“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我们主张吸收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而别开生面、另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唯陈言之务去。”我们提倡：勇于打破清规戒律，把探索与创新的理论勇气，贯穿到古典文学研究的全过程。我们欢迎那种开拓新的领域，发掘新的资料，发人之所未发这样的文章，即使有一些偏颇之处，也可供读者参考，并能够引起争论，以利于把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这比那些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高文典册”有益得多。

当然，我们所谓的“新”，是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之“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故意去标“新”。更不是凭主观臆断，信口开河，为了哗众取宠而发的一些稀奇古怪之论。我们所说之“新”，是要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得出的新观念、新命题。我们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赞赏敢于不同于流俗的勇于独树一帜的学风。当然我们也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决不能够一蹴而就，这就要求每位作者能够长时间地在这一领域不断地耕耘，还需要广泛地占有资料。我们

只有把这作为一个目标，要求同志们努力争取，逐步予以实现。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古典文学新论》这一园地所发表的文章在质量上能够不断地提高，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朵新葩。

对于湖北大学、武汉广播电视大学、襄樊大学、湖北师院、荆州师专、孝感师专、咸宁师专、郢阳师专、湖北教院、孝感教院、黄冈电大等校和武汉出版社给予学会的支持，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 者

1989年11月

目 录

卷头语	(1)
重新认识孔子思想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兼论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	张国光 (1)
毛诗序与儒家诗论	黄瑞云 (10)
“周南”“召南”何以居《国风》之首 ——历代关于“二南”的考释述评	何新楚 (23)
我国古代军事文学的民族性格 ——从先秦史传、《三国演义》谈起	曾宪祝 (32)
《离骚》的主旋律 ——“余独好修以为常”试解	刘贵华 (47)
论司马迁、班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之得失	贺光速 (55)
赋之名、之源辨略	萧世杰 (64)
品文与品人——谈对《谏逐客书》的评价	周绍勉 (70)

司马迁理想人格的形象表现

——读《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

..... 张 剑 (74)

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 祝凤梧 (81)

论陆机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

..... 金家兴 (92)

知音异代论萧陶

——兼驳萧统弱冠为陶潜结集说

..... 张虎升 (101)

唐代艺术的发展及艺术诗的繁荣简论

..... 王启兴 (109)

论贞观文学思想..... 喻 斌 (118)

《兵车行》写作背景探讨

..... 傅运里 (132)

孟郊与中唐诗歌革新..... 马承五 (139)

“山”与许浑诗风..... 王远彦 (147)

丰富了唐诗宝库的李商隐无题诗

——兼谈《锦瑟》的主题

..... 邱汉松 (156)

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创新意识..... 丁光清 (165)

柳永——北宋词坛第一位革新家

(为曾大兴著《柳永和他的词》一书写的序言)

..... 张国光 (178)

“谪居于黄，其诗一变”

——再论苏轼在黄州的诗歌

..... 黄海鹏 (186)

试论旷代词人苏轼的瑕疵..... 程伯安 (197)

黄冈诗人潘大临	陈文新 (205)
苏辛词风辨异	刘仁松 (212)
《入蜀记》与三峡景观	夏德纯 (221)
《西厢记》杂剧中崔莺莺形象的典型意义	万国邦 (231)
王《西厢》中的莺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单长江 (238)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塑造	张发祥 王界敏 (247)
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阶段性和变异	石 麟 胡绪伟 (258)
对《水浒传》及明后期文学民族文化心理的审视	曹裕江 (267)
两种《水浒》，两种“保护色”	余大平 (276)
简析《西游记》中的如来佛	章 立 (283)
略论《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的形成	赵培养 (294)
论袁中郎的文学观	盛瑞裕 (305)
晚明士子与“儒者为吏”	
——袁中郎杂著社会思想内涵之一	李富轩 (319)
豪情似火，哀思如潮	
——孟称舜剧作风格简论	胡绪伟 (327)

金圣叹“削‘忠义’而存《水浒》”的进步用心	李儒科(336)
金圣叹的“《赤壁赋》评”鉴赏	徐耀明(344)
从《三国演义》评点看毛宗岗的小说情节论	徐又良(351)
论《红楼梦》若干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	童国安(361)
论晴雯	李怀福 彭志新(368)
龚自珍悲剧心态的成因	周月亮(377)
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研究	古建军(386)
试谈整体性原则在刘熙载《艺概》词论中的作用	汤江浩(395)
“至语亦常语，出色而本色”	
——读臧克家先生的《略谈“诗眼”》质疑	田长元(403)
略论题画诗的艺术性	常光强(411)
古代文学作品注商	江琦(418)
古诗特殊的押韵形式简论	谭汝为(425)
巴黎所见中国通俗小说罕见板本述录	程亚琳(435)

重新认识孔子思想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兼论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

张国光（湖北大学）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纲领性的文件。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将从这里吸取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笔者长期在高校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于讲话中明确指出的“要积极吸收我国历史文化和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当前要特别注意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这一点，感受尤深。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能拒绝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精华。但就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论，应特别强调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并鼓舞人民沿着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奋进。

紧接着在国庆讲话之后，江泽民同志又在去年10月8日接见参加孔子讨论会的中外学者讲话中称“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并指出：“对于孔子思想中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很好地继承学习”。我认为作为党的领导人，江泽民同志对中外学者发表这样高度评价孔子的谈话，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历史新时期的发

展，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方针的进一步落实。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解释了为什么希腊的艺术品仍然能够给后人以美的享受的原因。列宁也说：“在列夫·托尔斯泰的遗产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俄国无产阶级要接受这个遗产，并要研究这个遗产”。他肯定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早就强调了：“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还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写道：“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并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同志又称“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并批判“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还引证了毛泽东同志1943年的谈话：“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958年在武昌会议上他又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以上引证，可以充分说明：江泽民同志如此高度评价孔子的讲话，在思想上是和上述精辟论述一脉相承的。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在今天要高度评价孔子，可能会使一些文学研究者、语文教师感到困惑，他们会问，我们不是一贯赞扬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吗？这和今天的如此高度地评价孔子能够统一起来吗？

关于如何评价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历史公案，我在1982年发表的文章中作了些解释。我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区分儒家思想中的糟粕和精华，而分别予以舍取。我当时写道：“当然，我们不否认所谓儒家的正统思想中含有保守的，落后的成份，属于应该剔除的糟粕之列。但必须明确：这些糟粕有一部分与孔、孟并无关系，而是后人硬塞进‘孔家店’的货架上的，例如鼓吹极端的专制主义，宣扬愚忠、愚孝的行为，以及提倡妇女殉节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论，还有以八股文取士，开利禄之途，并束缚读书人的思想等，这乃是法家、宋儒和明清统治者作俑，而其源并非出于孔、孟。”（《〈歧路灯〉论丛》第一辑，中州古籍出版社）即以妇女再嫁问题而论，《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离开焦家以后，不是有县官乃至太守的“公子”来礼聘她吗？如果说这是民间文学作品，那至少也可以部分看到当时的习俗。何况象王安石那样在自己的儿子得精神病死后，要儿媳改嫁这样的事，在中世纪乃至近世的知识分子中，亦屡见不鲜呢？这说明关于妇女守节的封建禁锢，主要不能归咎于孔子。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就应恢复孔子的历史本来面目，再据此评论他的功过。

可惜五四的先驱者，当时来不及对于这样复杂的学术问题细致地加以辨析，便把上述的思想糟粕一股脑儿挂到孔子的帐上，于是，孔子就被诋为维护封建制度的最大权威，和一切腐朽的没落文化的代表人物，这不是历史上的一桩大冤

案和错案吗？在今天，我们已有了充分的条件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把孔子放到两千年前的广阔的世界背景上来考察，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当然也应该看到：五四时期，中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这时，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已经完全腐朽，旧的传统象一座大山窒息了亿万人民的心灵和智慧，它亟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唤醒民众，推进社会改革。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树立一个科学与民主的对立面，就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作为猛烈抨击的对象，这也许是发动群众的需要。李大钊同志就说过，当时要打倒的孔子，和历史人物孔子并不完全等同。李大钊同志在1916年创办《民彝与政治》，就是用孔孟所提倡的性善论和他们所赞扬的《诗经》中的“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作为宣传民主思想的杂志的主旨，还引用了孔子所说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和孟子说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并指出：“真能学孔、孟者，……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他强调孔、孟并没有“责人以必牺牲其自我之权威”。如果我们再联系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和“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等格言，就可见孔子确是一位尊重个性，坚持原则，并鼓励后人为真理、正义和民族利益而献身的教育家。

我认为五四运动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是一些先驱者却不了解：一贯提倡独裁专制，实行愚民政策，并残酷镇压人民的，乃是以商鞅、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这个看法始自谭嗣同。李大钊同志也写道：“中国无学术也，有之则李斯之学也；中国无政治也，有之则嬴秦之政治也”。这都说明了反封建应该首先反对如郭沫若先生在

《十批判书》中所指出的把人民当牛马、猎狗和豺狼驱使的法家。

鲁迅先生在他写的讲义《汉文学史纲要》中，已肯定儒、墨二家，“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又说：孔子“祖述尧舜，欲以救世弊”。他还盛赞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云：“秦既焚书，坑诸生于咸阳，儒者乃伏匿民间，或者委身于敌以抒愤怨。故陈涉起匹夫……而鲁诸儒持孔子之礼器归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还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1935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可以说是鲁迅对孔子的“晚年定论”。他写道，孟子批评孔子为“圣之时者也”。

“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这说明孔子能顺应时代潮流。鲁迅还反复指出：“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子死了以后种种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装。”又说：“孔子这人，其实是死了以后也总是当敲门砖的差使的。”正是由于孔子已被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者利用来作为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的工具，而一代又一代的封建遗老、遗少又都把孔子当作自己的保护伞和精神支柱；这样，孔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万炮齐发猛烈轰击的最大偶像。这乃是时代造成的不幸：一位向来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大师所顶礼膜拜的孔子，却被自己的同胞——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者当作最大的“批斗对象”，岂不是五四运动的很大偏差！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怎么能至今还不“纠偏”呢？因此，我们今天为孔子“甄别平反”乃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再说，五四运动的一些知识分子在认识上的偏差问题，早已由毛泽东这位高度评价五四的伟人提出过批评。他在

《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现状，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好就是绝对地好，坏就是绝对地坏。”请问，笼统地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包括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学说）都认为“绝对地好”，而对于中国文化例如汉字、中医、京剧、旧诗、山水画，特别是把孔子和儒家看作是“绝对地坏”，几乎要彻底打倒之；这不是五四时期某些前驱者思想上的偏激表现吗？因此，我认为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和五四运动的主导思想原是一致的，它是五四运动的进步传统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多年来的反孔思潮，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政治条件下形成的，由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首先使腐朽了的统治者丧失了抗争的勇气，形成了“官怕洋人”的传统，一些崇洋媚外的知识分子又宣传“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于是在民众中也多少滋长了一种殖民地的自卑感，这就是“全盘西化”论的社会基础。这一思潮既是从右的方面抵制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又是从“左”的方面否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革”时期“左”的思潮泛滥，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上，而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也就被视为现实中的一切罪恶之源。当时，批判林彪的反党叛国罪行，却要拉出孔子作为林彪的“思想根源”，未免太不伦不类了！至于1974年的“评法批儒”，更是把本来不属于孔子的落后反动思想强加于孔子身上，以便对他进行咒骂。甚至还把孔子的进步言论硬判为反动性质，借以搞影射哲学。“四人帮”表